

※ 書刊評介 ※

「記憶」之書 ——導讀朱天心《古都》日文版*

清水賢一郎著 張季琳**譯

「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

小說《古都》一開始，靜靜說出的是「你的記憶」的挫折，是向「記憶」崩壞、流失的「你」的質問。但是，所謂的「你」是誰？發出那質問的「我」又是誰？在那裏不只「記憶」，連「我／你」存在論式的位相（表徵）也開始動搖、漂流……。

構成朱天心文學核心的就是這種對於「記憶」和「自我認同」（identity）的某種挫折，以及從其中重新發問的姿勢。這和臺灣「歷史」上的作家朱天心的「位置」，尤其是所謂「外省人第二代」的身分（自我認同）有不可分割的關連。

所謂外省人，指戰後跟隨國民黨政府，渡海來到臺灣的人們；相對於此，戰前就住在臺灣的人們，稱為本省人。

自一八九五年起，持續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地時期，臺灣人（本省人）被迫同化於日本人。尤其，戰爭時期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皇民化政策下，臺灣人也被強迫參拜神社和使用日語。戰後，臺灣歸還中國（中華民國）。臺灣人本以為自由時代已經來臨，不料，才一瞬間就如同一般人所說的，竟然是「狗（日本人）去，豬（外省

* 朱天心《古都》日文版，譯者清水賢一郎，日本北海道大學副教授。《古都》日文版由國書刊行會，於2000年6月出版。

** 張季琳，本所助研究員。

人)來」。在「外來政權」國民黨政府強權的一黨獨裁體制下，本省人苦於受到各種各樣的差別待遇和壓制，而僅佔全人口百分之十五的外省人卻獨佔了中樞政權，並限制本省人參與政治，在法律、語言、文化等所有層面，貫徹高壓的大陸中心主義，敷衍虛應腳下的臺灣。對於這樣的社會情況，本省人的怒火在一九四七年瞬間爆發，這就是所謂的「二二八事件」。這事件之後在臺灣社會留下了深刻的傷痕，直到現在依然影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根深蒂固的對立結構（省籍矛盾）。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內戰失敗，撤退到臺灣。朱天心的父親也是這時候來到臺灣的一員。朱天心的父親來自山東省，而她本人則是在臺灣出生、成長的「第二代」。但是，一般人根據她的「祖籍」，稱她「山東人」。然而，對於從來沒有去過大陸「故鄉」的她們（外省人第二代）來說，所謂的「故鄉」，是經常搖擺於觀念性的虛構場所和實際生長的臺灣之間，被撕裂為二者的存在。這剛好與為保持虛構的整合性，而主張臺灣的首都始終是在大陸南京，以致讓臺北陷於所謂「臨時首都」的尷尬狀態，是相同的結構。究竟自己是什麼人呢？中國人？臺灣人？這種歸屬意識也經常是處在被撕裂的狀態，而在學校被教導以大陸為中心的「歷史」。因此，長期以來住在臺灣的人們雖然在臺灣生活，卻對臺灣的歷史一無所知。

但是，從七〇年代末，情況開始慢慢地有些變化。不久，八〇年代，臺灣社會迎接了爆發性的劇烈變動，經由經濟發展，以本省人為主的民主化、臺灣獨立運動益形熱烈高昂。一九八六年，民主進步黨（民進黨）組成戰後臺灣的第一個在野黨。一九八七年，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被解除。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後，李登輝成為第一位本省人出身的總統。「民主化」和「臺灣化」（在臺灣稱「本土化」）的大浪潮一時波濤洶湧而來。

如此，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文化上的聯繫逐漸淡化，代之而起的是被稱為「臺灣意識」的臺灣民族國家主義(nationalism)。「臺灣意識」幾乎淹沒社會全體地急速成長為壓倒性的主流。臺灣話和臺灣的傳統儀式和活動也被恢復了。臺灣「歷史」的重新挖掘，正急速地進行著。瞬息萬變的臺灣現代史，迫使臺灣人民重新認識、評估「歷史記憶」和「自我認同」。

在此，先簡單瀏覽一下作家朱天心的「個人歷史」(personal history)。

朱天心，一九五八年三月，出生在臺灣南部的鄉下，高雄縣鳳山市的眷村（侯

孝賢導演的「童年往事」以這裏為舞臺）。父親朱西寧是著名的小說家，母親劉慕沙則是有名的日本文學翻譯家。姊姊朱天文也是作家，以擔任侯孝賢電影劇本的寫作而聞名日本；妹妹朱天衣，曾與二位姊姊合著隨筆集。朱天心上小學前，因為父親工作調動來到臺北以後，就輾轉在臺北市內各地的眷村度過青春時期。所謂眷村，是政府為一九四九年跟隨國民黨政府遷移到臺灣的軍人、公務員和他們的家屬所臨時建設，以宿舍為主的居住區域，也就是所謂外省人的聚落。

在雙親和姐姐的影響下，朱天心十幾歲就開始創作，十五歲時，處女作即刊載於《中華日報》。就讀臺灣大學時，和姐姐朱天文及日後成為其夫婿的謝材俊等臺大友人，共同創刊文藝雜誌《三三集刊》（擔任主編），並參與「三三書坊」出版社的設立。一九七七年，出版了描寫北一女中學生時期的長篇散文《擊壤歌——北一女三年記》和短篇集《方舟上的日子》，為臺灣文壇吹注了一股清流，因而受到眾人的注目。一九八〇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之後，也陸續出版《臺大學生關琳的日記》（一九八四年，再版更名為《時移事往》）等作品。

直到這時期的朱天心，都是以多愁善感少女的形象和內容輕鬆自然的校園小說風格，獲得同一世代的支持。當年作為朱家姐妹「啟蒙師」，對她們的創作給予許多影響的胡蘭成（以作為張愛玲的丈夫而知名），甚至曾將朱天心比擬為飄逸詩人李白。

但是，五年後，一九八九年出版小說集《我記得……》以後，文風從原來取材自身邊事物的青春小說，一轉為對當下現實「狀況」的強烈關懷，政治色彩漸趨濃厚。這寫作風格變化的背後，可能與前述臺灣社會「本土化」的激烈變動有關。這時期，朱天心曾和侯孝賢、作家張大春等人，加入朱高正等人所組成的社會民主黨（社民黨）的文宣工作。在《時報週刊》等雜誌，發表多篇政論時評，挖掘潛藏於「臺灣意識」中狹隘且非理性的側面，目前則專注於創作。

〈古都〉，撰寫於一九九六年。這一年，在小說舞臺的首都臺北，民進黨取得政權；本省人李登輝在首次直接民選中，再度當選為總統，本土化（臺灣意識）以破竹之勢，更形高揚。這時期，臺灣話和臺灣「歷史」的科目，在學校被當成正式的教育課程來實施，一時成為熱門話題。為了當作為臺灣人的「自我認同」和一個「國家」的正統性背書，「共同性的記憶」被要求重編，「正史」被要求重新撰寫。

相對於大寫的「歷史」再構築的動向，〈古都〉是由以前處於中心地位，而現今被放逐到周邊的外省人，尤其「外省人第二代」的作家所寫成有關「歷史」和「記

憶」的內省之作。本作品雖然明顯地含括本土化激流裏被「忘卻」了的少數派的生命，及如何拯救「歷史的記憶」等問題，卻不能將其和以告發「正史」，篡奪「記憶」，單線式「反民族主義」的文學相混同。實際上，只要一讀小說，就很容易地發現，那樣的解讀是多麼平板、乏味。然而現實上的臺灣，遺憾地卻存在著只單純地依據所謂「外省人第二代」作家的出身背景，就議論其小說內的「政治」諷刺，而以此政治標籤為根據，將作者嵌入所謂「外省人第二代」刻板模式的攻擊——朱天心的小說文本，正是針對那類狹隘、僵硬、不寬容的心性者而提出異議的。

事實上，朱天心的出身背景，絕不容許被還原到那種單純、武斷、本質主義式的血統決定論。如本文所介紹的，朱天心的父親雖是外省人，母親則是臺灣苗栗的本省客家人，丈夫是本省福佬人。說起來，在她的生命裏，存在著臺灣社會的「多民族性」。朱天心作為一個生長在臺灣的人，自始至終是以臺灣這個「場所」做為她創作的原點。

當然，我們必須經常自我警惕，儘可能地避免那種，將作者的身分毫無媒介地直接和作品結合的單純、武斷的解讀。其實，即使不必自我警惕，朱天心的文本，無論從其內容或形式，都已大聲響震著拒絕被還原至單一意義或整體性的複數「聲音」。朱天心的文本迂迴於多層而錯綜的時間／空間之縫隙，並已朝向漫遊者（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語）的「眩惑」和「陶醉」開啓著。

書名作「古都」是本書中特別複雜、豐饒的文本。那如同體現「事件的記憶」般，乍看混亂或感覺矛盾的無秩序述說，確確實實地由鮮明強烈的細節支撐著，並浮現幾近可怕的「多層性」。因此，如同電影「悲情城市」般，希望讀者能仔細傾聽從文本各角落若無其事地投出的一個個話語的呢喃聲，並和它們持續「對話」，且要不只一次，而是三番二次地反複閱讀。接下來談談，作為閱讀〈古都〉的索引，也是令讀者感到「眩惑」的兩項裝置——「地名」和「引文」。

首先，關於「地名」的問題。有關臺北都市的歷史，請參看「新臺灣文學」系列叢書之一《臺北ストーリー》（《臺北故事》）所收載山口守的導讀。從臺北的街道名稱，就可以知道它們因為統治者的便利，曾被恣意更改過幾次。清代的「街」，在日本統治時期的一九二二年，為達成臺灣人的日本化目的而全部被改稱「町」。戰後，在國民黨政府的手裏，雖然回復了中國形式，卻變成既有「街」，又有「路」的名稱。譯者翻譯本書時，保留日本時代的「××町」；對於戰後的名

稱，則以日文的假名，加註中國話的讀音，以方便讀者理解。不過，有時作者在述說學生時代的回想裏，卻混入日本時期的地名。這情況如同本書作者朱天心為本日文翻譯版所寫序文的說明：「新舊街道地名混雜並陳（如日據時代、國府時代、李登輝、陳水扁時代）」，這是作者故意要讓「讀者迷惑不解」^①。小說〈古都〉裏出現的地名，不僅是單純表示地圖上一個點的空間位置，也含有臺灣人生活上所發生的「事件——歷史」的寓意。我們讀者和主人公一起徘徊於臺北的大街小巷，在「時間」之中去來，挖掘出作為都市「記憶」的歷史地層。另外，主人公拿著在京都購買的日文「殖民地地圖」，漫步在臺北街道。這本旅遊書的「範本」，可能就是《臺灣 近い昔の旅・臺北篇——植民地時代をガイドする》（又吉盛清著，凱風社，1996年）^②。這是一本適理解臺北「記憶」（歷史）的入門書，建議各位讀者在「紙上」旅行臺北時，最好能夠攜帶此書同行。

其次，關於「引文」的問題。〈古都〉，如同該標題所表示般，是由川端康成以京都為舞臺，描寫美麗的雙胞胎姊妹故事的「引文」所組成。這首先是為了將京都的永恆性和臺北的剎那轉變加以對比的裝置。不過，不僅於此，隨著小說的閱讀，可以清楚理解京都和臺北之間，宛如川端所創造的千重子和苗子兩姊妹般，明顯地刻印著所謂「雙胞胎城市」中「不被記憶的歷史」。而且，因為用漢字（缺少聲音的文字符號）記載「地名」的效應，使得現在被敘述的究竟是京都的「圓山」（maruyama）？還是臺北的「圓山」（yuánshān）？兩者間的分割線也開始搖擺不明。而這類兩項對立無效化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遂導致異鄉／故鄉、殖民地／被殖民地、自己／他者、真／偽……等一連串分野境界的動搖。

又，將小說的敘述分割所夾雜引用的各式文本，也須注意。因為這些帶有啓發這篇小說的多種「解讀」的索引作用。例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引用，暗示了〈古都〉這篇小說是「都市的無意識」的「夢解析」。梭羅（Henry D. Thoreau）或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的引用，則表示這篇小說中有關植物的描寫，是要求能夠擁有理解自然與歷史性以及文化、政治的複雜關係的視線。

另外，必須指出〈古都〉裏有大量的「引文」是來自朱天心以前的作品，而將

① 朱天心為《古都》日文版所寫的序：〈致書日出處〉，日文譯為〈日出處に致す書——日本語版刊行によせて〉。

② 臺灣版由魏廷朝譯，前衛出版社，1997年出版。

之解構／再語境化 (de-/re-contextualize)。不過，本文暫不揭穿這謎底。

最後，不得不指出還有一個引用頻度，和川端康成或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可以匹敵，卻沒有標示出處的極重要的「引文」。那就是連橫的《臺灣通史》。在接近小說開頭部分的「咸豐七年春正月，淡水大雪」，或小說最後所引用的「婆婆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等等皆是。尤其後者是《臺灣通史·自序》結語的這一句話，臺灣的國文教科書也大多採用。對臺灣的讀者來說，即使作者不清楚地標示出處，也一目了然，立刻就知道是從哪裏引用的著名文章。著者連橫（本次選舉中，代表國民黨出馬競選總統失敗的連戰的祖父）撰述《臺灣通史》的意圖，如同他在〈自序〉開頭第一句就明白表示的，是因為「臺灣，固無史也」——他痛感臺灣沒有「歷史」，而為臺灣撰寫「歷史」，以確立作為臺灣人的存在根據（自我認同）。朱天心的〈古都〉，雖然是以「這是哪裏？……你放聲大哭」作為結語，不過，最後的「引文」，則明顯地是對於「美麗之島」臺灣的期許的高聲歌頌。我們該如何來解讀這互文呢？當然任由讀者自行決定。

在現代臺灣文壇經常以提出「事件」的「記憶」，而受到注目的朱天心，到目前翻譯成日文的作品只有〈記憶の中で……〉（〈我記得……〉）（三木直大翻譯，新臺灣文學系列叢書《臺北ストーリー》所收）和〈眷村の兄弟たちよ〉〈想我眷村的弟兄們〉（現代中國語講座《孩子王》班翻譯，藍天文藝出版社《裏外・中臺之間——二つの家郷のはざままで》所收）而已。作為翻譯者，我非常高興這次能完整地將朱天心的文學呈獻給日本讀者。

本書是麥田出版社「當代小說家」系列的第六冊，於一九九七年五月出版。在閃爍著榮獲一九九七年度圖書出版「三冠王」的光輝中——行政院新聞局圖書出版金鼎獎（創作部門）、《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聯合報》讀書人最佳圖書獎，又獲得第二十一屆《時報》文學推薦獎。因此，一九九九年八月，特別出版發行收錄朱天心自序的精裝「珍藏紀念版」。

本翻譯使用一九九八年一月發行的初版第六刷。作品的編排秩序，依照翻譯者的判斷，採用與原書顛倒的「歷史溯源」方式，將〈古都〉調整為首，其次是〈匈牙利之水〉、〈第凡內早餐〉、〈拉曼查志士〉、〈威尼斯之死〉。

本書得以順利完成，乃承蒙多人的幫助和照顧。尤其有些不瞭解的地方，很幸運地親蒙原作者朱天心小姐本人在臺北的咖啡廳、櫻花的京都和從札幌（北海道）發出的電話與傳真的指教。這些成爲我在臺北、京都、札幌三個都市之間的「三都物語」，是分享時間和空間，無法欠缺的寶貴記憶。只是隨著翻譯的進度浮現出來的問題也愈來愈多，令譯者深有感觸的是，恰如模擬京都在臺北建設圓山公園和臺灣神社，其祭拜的神祇則仿效「內國殖民地」的札幌神社（同樣坐鎮於櫻花名勝的圓山公園）的「開拓三神」般，小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依據令人神智昏迷般的互文性和其他超越時空的話語，演出多層次的「對話」。本導讀雖闡述了問題的一端，然而其中仍埋藏著許多尚未被挖崛出來的「事件」，是自不待言的。

本書的翻譯雖然還有某些局限性，但也讓我學習到許多的事情，而這些對我而言，不外是一個「事件」。感謝給予我珍貴機會的編輯委員們，對於以超人的耐心，從譯稿的校對到地圖的製作，完全支援我的編輯部的島田先生，也致上衷心的感謝。如果沒有島田先生支持，可以斷言本書絕無法以這樣完整的形式出版。此外，本書的出版是得到臺灣文化建設委員會的贊助才實現的。譯者在道歉出版遲緩的同時，也要正式地向該單位表達感謝之意。

二〇〇〇年五月，於首任在野黨總統誕生的「記憶」中。